

# 工业化对晚清捐官的影响研究

## ——以新式企业发展中的产权保护机制为中心

燕红忠 卫 辛\*

**摘要** 本文基于清代官员履历档案，从产权保护的视角实证研究了近代工业化对晚清捐官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由于缺乏正式法规和特许权的保障，不同于官办和外资企业，以民办企业为代表的近代新式企业的发展，促使人们通过捐官纳衔的途径来提升社会地位，寻求产权保护。本研究通过对近代中国工业化推进过程中产权保护的独特机制讨论，为理解近代经济发展、产权保护与官僚体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微观视角。

**关键词** 新式企业，捐官制度，产权保护

**DOI:** 10.13821/j.cnki.ceq.2019.04.17

### 一、引言与文献

制度安排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制度经济学家强调了制度和产权保护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实证研究。例如，North and Weingast (1989) 的开创性研究探讨了英国光荣革命和宪政民主制度的建立，确立了权力的可信承诺，促进有利于产权保障的各项经济制度的逐步建立，而更有保障的产权则为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Acemoglu and Johnson (2001, 2005)、Acemoglu *et al.* (2005) 通过欧洲殖民者在各殖民地区的初始制度设计解释了这些地区当前人均收入的差异，并强调了良好的产权保护对经济长期发展的促进作用，即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防止特权阶层对企业财富的掠夺。在诺斯的基础上，Jha (2015) 进一步利用英国议员的个人传记，指出光荣革命对于王权的限制主要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的海外贸易和股份制企业股权。这些研究及大量相关文献都认为，制度和产权保护为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 燕红忠，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卫辛，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中泰证券研究所。通信作者及地址：燕红忠，上海市杨浦区国定路 777 号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楼 310 室，200433；电话：(021) 65902210；E-mail：hzhyansx@163.com。本文感谢“数理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上海财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官僚体制、官员激励与经济发展的关系。Maskin *et al.* (2000) 提出基于经济增长业绩的晋升标尺赛 (yardstick competition)，周黎安 (2007) 提出“晋升锦标赛”的假说。这些研究通过人均 GDP 等代理地方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探讨了地方经济绩效与官员升迁变动之间的因果关系 (如 Li and Zhou, 2005; Landry, 2005)。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承认官员执政期间的经济绩效会显著增加其晋升的概率 (如周黎安, 2007; 王贤彬等, 2011; 杜兴强等, 2012)；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对这一假说提出了质疑。姚洋和张牧扬 (2013) 的研究认为，经济增长不会显著影响官员的晋升；Landry (2005) 的研究也发现，人均 GDP、FDI 规模、服务业份额等经济指标并不是影响官员升迁调动的主要因素。Opper and Brehm (2007) 进一步指出，经济绩效并不能提供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而政治关系网络、忠诚度等对省级官员的升迁变动则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除了对当代经济发展和官僚体制的关注，传统官僚体制与经济长期发展的关系也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如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以及围绕“李约瑟之谜”的大量探讨。最近，Bai (2014) 利用学额制度探讨了科举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晚清科举制度废除后，学额越多的地区新式企业设立越多，并且更多的学生会被送往日本留学，因此科举教育是抑制西方技术传播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Bai and Jia (2016) 进一步对晚清科举、社会稳定和政治变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提出科举制度废除后，使得原本以科举作为上升通道的知识分子丧失提升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因此会转而参加革命，影响社会稳定。代谦和别朝霞 (2015) 讨论了唐代“均田制”改革与科举制度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均田制”的实施打破了传统贵族势力的政治垄断，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发展和社会流动性的提升。

关于清代捐官制度的现有探讨，大多是从政府财政和企业资金筹集的角度着手，认为自然灾害、战争起义所造成的财政压力促进了捐官制度的出现和发展 (许大龄, 1976; 伍跃, 2013)。同时，也有文献将科举制度与捐官制度进行比较，指出捐官制度促进了吏治的腐败 (谢俊美, 2001)。

不同于现有文献从官员激励、社会流动等视角对官僚体制和经济发展关系的讨论，或者基于财政压力对清代捐官的解释，本文所考察的是近代工业化发展对于捐官制度的影响及其机制。此外，本文也不同于经典文献中关于英国宪政民主制度、产权保护与工业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我们所探讨的是近代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在缺乏正式法规保障的背景下，工业化的推进与产权保护的机制问题。中国的工业化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而直到 1904 年才开始陆续颁行《商人通例》《公司律》等正式法规，以法律的形式确认民办企业的合法地位。但为了鼓励人们投资兴办新式企业，清廷仍然不得不实行“立奖励实业宠以爵衔之制”，颁发《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华商办理实业爵赏

章程》《奖给商勋章程》等章程，通过给予不同品级的顶戴、爵位、职衔进行激励，促进人们对近代工业的投资。在这一背景下，本文的基本假说为：①在缺乏正式制度安排和特许权保障的背景下，近代中国工业化和新式企业的发展，促使人们通过捐官途径来提升社会地位，进而寻求产权保护。②由于官办或者官督商办企业本身就附属于政府体制，而外资企业享有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其经营者捐官的动机主要是官僚体制内部的晋升或单纯提升社会地位；而在缺乏明确的产权保护和公平竞争的社会保障条件下，新式民办企业则是通过捐官纳銜来寻求企业发展的产权保障。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不同于经典文献中关于西方早期工业过程中通过特许权和宪政民主推进产权保护的发展路径，提出在中国近代工业化过程中，新式企业通过捐官途径来寻求产权保护这一新的假说，从而弥补了在儒家伦理和缺乏正式法规保障背景下，工业化的推进与产权保护的独特机制，发展了制度、产权与工业化关系的研究。二是首次利用微观数据从量化实证的视角，更为规范地考察了新式企业发展与捐官制度之间的内在关系，不仅补充了许大龄（1976）、伍跃（2013）等学者关于历史上捐官制度的研究框架，拓展了费维恺（1990）、陈锦江（1997）等对晚清官商关系问题的定性研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经济发展和官僚体制关系的研究，同时也为处理当今企业发展中的官商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历史镜鉴。

本文以下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梳理清朝的月选与捐官制度，并考察近代新式企业的发展过程，及其对捐纳偏好产生的影响。第三至第五部分基于产权保护的动机和需求，使用量化分析方法探讨新式企业对捐纳行为的影响机制。其中，第三部分为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第四部分为基本实证结果；第五部分在数量实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人们的捐官行为和微观动机进行分析。最后是全文的简要结论。

## 二、近代新式企业与捐官制度

晚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和经济制度大转变的时期，也是捐纳制度更为完善的一个时期。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对政治和经济都有很大影响的新的因素，即工业化和新式企业的产生和发展。近代工业化的出现不仅加速了“自强”“求富”运动的兴起，也通过产权保护的动机和需求促使制度不断调整和变革。

### （一）近代新式企业

近代工业化始于一批新式企业的兴办，由于资金来源和管理方式的差异，出现了官办企业、民办企业和外资企业三种不同的方式。为了模仿生产西方

先进的枪支炮弹，1861 年曾国藩设立“安庆内军械所”，揭开了近代官办企业的序幕。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等一批企业随之建立起来。与清代前期政府主导的专卖商业部门相比，晚清时期的官办企业种类更加丰富，包括纺纱、呢绒、缫丝、燃料采掘、金属采掘等 21 个行业。其中，官办企业进一步可以分为政府出资管理的官办企业，以及官商共同经营的官督商办企业或官商合办企业。根据杜恂诚（1991）所收集的数据资料进行统计，燃料采掘业、金属采掘业等重工业中官办企业数量远高于同一时期的其他行业。这是当时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战略所决定的；而政府对重要资源的垄断经营和限制也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

由于政府的强制介入，官办企业经营效率低下，官、商之间的矛盾逐渐突出。政府也认识到仅仅依靠官办企业难以弥补庞大的经费需求，意识到“大抵兴利之事，官办不如民营”，因此在“求富”的背景下，民办企业开始得到重视。随着《马关条约》允许外资企业在华设厂，清政府进一步放松对私营经济的限制，承认华商自主设厂的权利，从而掀起近代民办企业发展的一个高潮，纺纱、面粉、火柴等轻工业企业广泛设立并快速发展。虽然民办企业在资金、规模上远低于官办企业，但其地域和行业分布更为广泛。此外，外资企业的设立最早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然而其最初发展是伴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而展开的，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得到迅速发展。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仅上海地区的外资企业数量就达到 1800 余家。尽管外资企业的主权掌握在外人手中，但是与官办企业和民办企业一样构成了近代工业化的重要力量。

## （二）捐纳与月选

### 1. 捐纳制度

自春秋战国开始，很多朝代都曾出现卖官鬻爵的现象。明清时期，科举、荫举与监生均为入仕做官的重要途径，监生即国子监学生的简称，由捐纳而取得应试资格者，亦称监生。清顺治六年，由于军费压力，开始允许捐纳监生，并一直延续下来。乾隆以前对监生加以严格考试，后来仅存虚名，一般未入府、州、县学而欲应乡试，或未得科举而欲入仕做官者，都必须先行纳捐取得监生身份，但不一定在国子监读书。

康熙时期，尽管政府允许出卖实官，但是在捐纳时间、捐纳资格、官缺数量以及捐纳金额上都有着严格限制，一般是作为军事、赈济的临时补给，并没有成为财政日常开支的组成部分。乾隆元年，请停捐纳，但是不碍铨选的项目成为常例被延续下来。捐纳规模较之初期虽然有所增加，但是政府对实职捐纳仍有顾虑，在战争、灾荒等外生冲击结束后，往往会停捐。直到 1851 年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对清政府统治造成重大打击，“惟以太平军起，

东南大震，军务日亟，各省军饷又非倚捐纳不可”（许大龄，1976，第61页）。此时的捐纳从临时性、地方性行为逐渐发展成为各个阶层踊跃参与的普遍现象，捐纳人数和捐纳范围都达到历史顶峰（许大龄，1976）。

与以前断续的、地区性的、没有制度化的买官现象相比，清代逐渐形成体系完整的捐纳制度。作为成熟的捐官制度，清朝捐纳有着较为严格的划分。虽然可以通过捐纳来直接获取实职官职，但更为常例的是捐纳例监、例贡<sup>1</sup>，以及荣誉性的虚衔奖励。实官的出卖价格一般大于荣誉性质的捐纳，也因为实职捐纳会对吏治产生影响而被政府部门所限制。从捐纳的官职看，捐纳不仅可以出卖文官，还可以捐纳武职，其中最为常见的武职捐纳是六品千总（陈锋，2008；伍跃，2013）。

## 2. 月选制度

捐纳官职只是获得任官的资格，而要得到真正的任派还需要严格的铨选，以实现以官补缺。其中，月选作为铨补官吏的主要方式，分为双月选和单月选。双月选又称为“大选”，逢双月开选；单月选又称为“急选”，逢单月而开。其中，双月大选两班，分别为初次授予官缺的除班，以及通过议叙、推升等方式掣籤的升班。单月急选更为细致，分为四班，包括转班、补班、改班、调班。清代中央郎中以下、地方道府以下除请旨、提调、拣选外的官缺均参加吏部铨选。因此，月选成为政府选取中下级官员的最主要途径，无论是科举、捐纳、还是荫举的候选官吏，都需要参加铨选来补缺。

从捐纳到月选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报捐者首先须向户部提交关于自己的详细信息和社会关系，并由当地衙门出具身家清白的证明，户部对其“呈文”登记后，依次进行审查，然后捐纳房会发付款通知。按要求交款完成后，在户部领取“户部执照”，报捐手续才算结束。另外，与捐纳贡生、监生等常例不同，“大例”的开放往往有着明确的时间和地域限制，同时因捐纳政策的调整，如降价出售官职，铨选优先权的变动等，从而导致并非按照注册排队的时间顺序来进行候选。因此，即使某些地区捐纳候选者人数众多，并不意味着其被掣籤获取官职的概率就高。1905年，清政府虽停止捐纳武职和科举考试，但月选官员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

为了更好地理解清代月选官员的捐纳状况，并满足量化实证分析的需要，我们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为基础，配合《钦定吏部则例》《清史稿》整理了光绪朝通过月选而获得官职的2837位官员的个人履历档案。<sup>2</sup>图1为月选官员的捐纳分布情况。图中最上面的虚线分别是捐纳总数和获职官员中的捐纳总比例，捐纳总数统计的是各年月选官员中具

<sup>1</sup> 例贡是指秀才通过捐纳钱粟取得贡生身份。例贡不算是正途，因此不被人所看重。

<sup>2</sup> 由于原始月选数据缺少1885年、1888年、1893年、1900年四年的记录，本文后面将根据剩余30年的数据构建捐纳与企业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有捐纳经历的数量，包括捐纳“考试等级”（身份）和捐纳实职的总和。中间的虚线是捐纳实职的数量和比例；下面的实线是捐纳“考试等级”（身份）的人数和比例。可以看出，虽然部分年份具有捐纳经历的入选官员比例达到 50%，但是平均维持在 30% 左右。捐纳实职平均维持在 20% 以下，捐纳身份的比例最低，平均维持在 15% 以下。从任职官职的层级来看，在掣选的道员中，捐纳实职的比例为 4% 左右；在知府中，捐纳实职的比例约为 12%；知县的比例稍高，基本达到了 20%。显然，尽管晚清捐纳人数和捐纳规模都达到了历史高峰，但是从获职官员中的捐纳比例来看，并没有呈现出稳定的增长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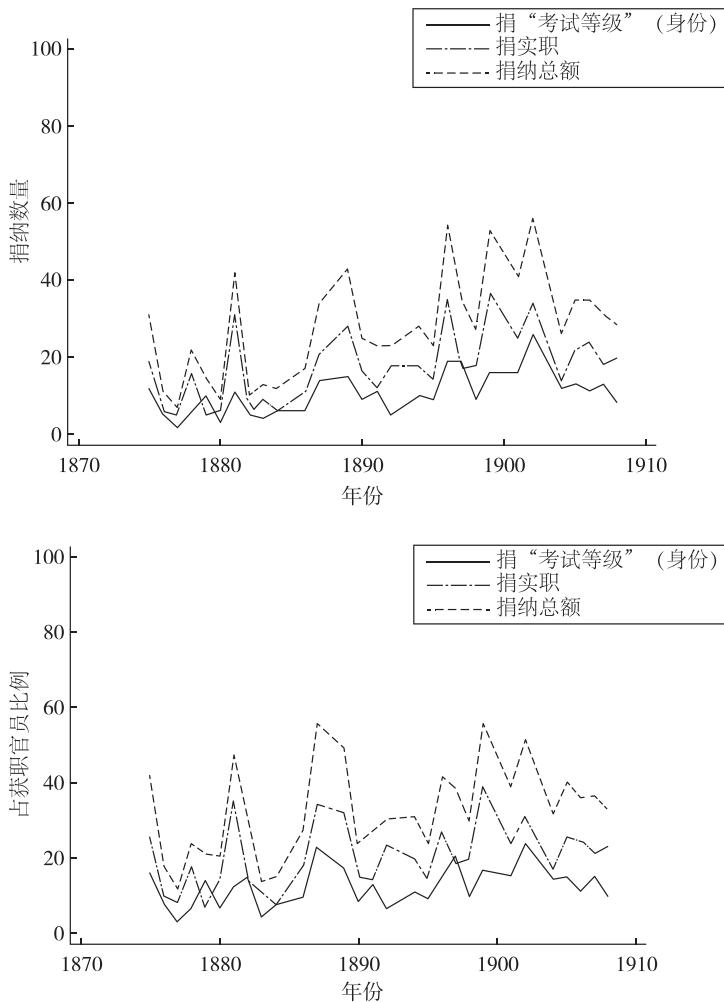


图 1 晚清月选官员的捐纳分布

资料来源：以《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1997）为基础，配合《清史稿》中部分人物信息综合整理。

### （三）新式企业对捐纳行为的影响

“买官”现象在传统社会长期存在，并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完善。在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使一些腰缠万贯的商人和大地主尽管经济条件优渥，却政治地位低下，为了获得更多权益，出资购买官爵便成为其提升社会地位的有效途径。另外，科举制度虽然为文人参与政治，乃至社会阶层的流动提供了机会，但因整个官僚队伍狭小，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无法进入为官之列。特别是科举考试的录取率长期呈下降趋势，据统计，明初乡试举人的录取率为6%，嘉靖以后下降到4%，清代进一步下降到1%—2%（巫仁恕，1999）。因此，通过直接捐官或购买“考试等级”（身份）来跨过科举过程中的一些层级，如获取以贡生、监生为代表的国子监读书资格，就成为人们跨入官僚行列的主要捷径之一。

随着近代工业化和新式企业的兴起，捐纳成为提升商人地位，参与社会经济和推动企业发展的重要途径。“盖中国官商不相融洽，商虽富余无兴国家，且往往见轻于时。自西人请弛海禁，南北海口遍立埠头……而渐有官商一体之意。然非各路剽荡发匪饷项支绌，借重殷商捐垫巨款，则商人尚不免市侩之羞，终不敢与大员抗礼，故商人之渐重当自西南收复之日起也。”<sup>3</sup>为了鼓励商人投资近代企业，清政府更是颁布章程允诺向投资者奖励官衔。“向来官场出资经商者颇不乏人，唯狃于积习，往往耻言贸易，或改换姓名，或寄托他人经理，以致官商终多隔阂。现在朝廷重视商政，亟宜破除成见，使官商不分畛域，合力讲求，庶可广开风气。如有世家巨族出资凑集公司，办有成效者，亦准按照以上章程给奖；其或已有官阶，职分较崇者，另由臣部随时酌量情形，奏明请旨给奖，以示优异。”<sup>4</sup>

在近代工业化的背景下，商人们之所以积极投身捐纳，一方面是“士农工商”文化熏陶下对提升社会地位，享受特权的渴望；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当时创办企业为新兴事务，缺乏正式的法规和产权保障，人们可以通过职衔和身份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商业，比如与政府沟通、交涉的资格，并免除或减少役税。由于通过捐纳而进入新式企业的官员较少受到儒学八股的熏陶，更容易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进而可以更好地适应新式企业的管理经营。例如唐廷枢、盛宣怀、严信厚、李金镛等优秀的企业家都有着这样特殊的政治身份（费维恺，1990；陈锦江，1997）。以轮船招商局为例，在1872—1890年间，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人员中，捐纳比例高达83%。1876年

<sup>3</sup> 《申报》，1883年，12月3日。

<sup>4</sup> 《奖励华商公司章程》，见汪敬虞（1957，第641页）。

创办的湖北开采煤铁总局，通过捐纳而进入管理阶层的人数众多，其中在开办三年中，就有候选道 1 人，候补知府 3 人，候补同知 32 人，候补县丞 1 人。<sup>5</sup>当然，由于官办或者官督商办企业本身就附属于政府体制，而外资企业享有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其经营者捐官的动机主要是提升社会地位和官僚体制内部的晋升。而在缺乏明确的产权保护和公平竞争的社会保障条件下，民办企业则是不得不通过捐官途径来寻求企业发展的产权保障。

### 三、模型设定与实证策略

#### (一) 实证模型

为了准确度量新式企业对人们捐官行为的影响，本文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并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影响官员掣选的因素。模型设定如下：

$$\text{juanna}_{it} = \beta_0 + \beta_1 \log \text{firm}_{it} + X'r + \delta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text{juanna}_{it}$  是省  $i$  在  $t$  年度内被掣选官员中具有捐纳经历人员的比例或者捐纳人数的自然对数，由于不同的捐纳类别对具体职位有着不同影响，因此，本文又将捐纳程度细化为获职官员中捐纳实职、捐纳身份的比例或者人数。 $\text{firm}_{it}$  是省  $i$  在  $t$  年度新建企业数量，由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资金来源、经营方式、社会背景差异很大，而且对于捐官的动机和机制存在很大不同，为了更好地识别捐纳行为和产权保护动机之间的关系，本文进一步将企业分为民办企业、官办企业和外资企业三种形式。

$X$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一般而言，当发生自然灾害和战争冲击时，基于财政压力和筹集款项的需要，政府会倾向于鼓励捐纳，人们通过捐纳而获取官职的概率也会增加，因此我们需要对自然灾害和战争冲击进行控制。其中，自然灾害的数据根据《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中的信息配合 ArcGIS 4.0 进行整理。由于在本研究中灾害的程度相对灾害种类来说更为重要，因此我们直接构建灾害程度指数，具体计算公式为：受灾程度指数 =  $| \text{disaster} - 3 |$ ，其含义是如果数值离中值 3 越大，则表明灾害程度越大，越小则表明灾害程度越小。另外，根据中国军事史编写组（2003）《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中的信息，梳理了 1875—1908 年各地爆发的战争次数作为控制变量。此外，由于北京是清朝的首都，距离北京越近，受到的政治和经济辐射程度越强。由于官员任命由吏部铨选，信息传递、注册、排队等候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官员铨选的概率。因此，本文对各省省会城市到北京的距离进行控制，数据根据

<sup>5</sup>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二，《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和荆门矿务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12 页。

ArcGIS 4.0 计算。表 1 给出了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信息。 $\delta_i$  为省级固定效应， $\eta_t$  为时间固定效应， $\epsilon_{it}$  为随机扰动项。

表 1 主要变量统计描述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捐纳比例 (%)	540	27.42	29.25	0	100
捐纳身份比例 (%)	540	10.80	18.61	0	100
捐实职比例 (%)	540	16.99	21.99	0	100
捐纳人数	540	1.52	2.05	0	15
捐纳身份人数	540	0.57	0.94	0	7
捐实职人数	540	0.96	1.41	0	10
民办企业数量	540	0.75	2.24	0	28
官办企业数量	540	0.14	0.44	0	3
外资企业数量	540	0.27	0.90	0	7
自然灾害	540	0.80	0.71	0	2
战争次数	540	0.04	0.28	0	4
到北京的距离 (公里)	540	1 088.72	516.77	0	2 020.17

## (二) 工具变量估计

由于估计结果会受到度量误差、互为因果以及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影响，具有很强的内生性。为解决该问题，我们选择使用工具变量方法，为回归结果提供稳健性检验。由于捐纳也可能会促进新式企业的发展，我们以该省通商口岸的开放时间到样本研究时点的时间间隔 (年) 作为企业数量的工具变量，这是因为近代企业的发展是与通商口岸的开放密切相关的，口岸开放的时间越久、经济发展环境越好，越有利于企业的设立。然而清代吏部的铨选方式，各类型人才的铨选人数主要是来自国家法律制度的事先规定，与是否通商口岸并没有直接关系。另外，虽然经济发展也可能会增加本地区的管理机构和官员职数，但由于清代官员任职的地区回避制度，因此并不会直接增加本地区捐纳官员的任职。工具变量的两阶段回归设定如下：

第二阶段：

$$\text{juanna}_{it} = \beta_0 + \beta_1 \log \hat{\text{firm}}_{it} + X' r + \delta_i + \eta_t + \epsilon_{it}, \quad (2)$$

第一阶段：

$$\log \text{firm}_{it} = \alpha_0 + \alpha_1 \text{kouan}_{it} + \alpha_2 X_{it} + \mu_{it}, \quad (3)$$

其中，式 (3) 是第一阶段回归。 $\text{kouan}_{it}$  是省  $i$  最早通商口岸的存续时间 (年)，通商口岸的数据来自严中平 (1955)《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式 (2) 给出第二阶段回归。方程设定与回归方程式 (1) 的不同之处在于, 将第一阶段获得的  $\text{firm}_{it}$  估计值直接代入式 (2) 之中。

## 四、实证结果及发现

### (一) 基准回归估计结果

表 2 给出新式企业发展与获职官员中捐纳情况的基准回归估计结果。在第 (1)、(2) 列中, 我们以捐纳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 考察不同性质企业的发展对其影响。第 (1) 列为未添加任何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结果表明民办企业对捐纳程度具有促进作用, 相反官办企业和外资企业并没有显著地影响官员的捐纳程度。第 (2) 列控制了自然、地理等相关因素后, 回归结果依然显著。第 (3)、(4) 列为以捐纳人数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估计, 回归结果与以捐纳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相同。这表明, 基于产权保护的动机和需求, 新式民办企业的发展促进了人们的“捐官”行为。

表 2 基准回归估计结果

	捐纳比例 (%)		捐纳人数 (log)	
	(1)	(2)	(3)	(4)
民办企业数量 (log)	13.358** (5.769)	14.262** (6.829)	0.202*** (0.056)	0.138** (0.057)
官办企业数量 (log)	0.290 (11.984)	-3.324 (11.300)	0.044 (0.117)	-0.040 (0.094)
外资企业数量 (log)	1.120 (9.017)	1.875 (10.504)	0.092 (0.088)	-0.002 (0.088)
战争次数		-4.610 (4.443)		-0.029 (0.037)
自然灾荒		3.170* (1.743)		0.022 (0.015)
到北京的距离 (log)		0.803 (2.392)		-0.027 (0.020)
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省级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观测值	540	540	540	540
R-squared	0.015	0.262	0.048	0.478

注: 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p < 0.01$ , \*\*  $p < 0.05$ , \*  $p < 0.1$ 。

## (二) 稳健性检验

### 1. 地区差异的影响

为了验证地区差异对获职官员中捐纳程度的影响，我们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进行回归，具体结果见表3。在东部地区，民办企业对捐纳程度和人数都有促进作用。然而，在中西部地区，对于各种形式的企业，其估计系数都不显著。说明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对于捐官需求及晚清官僚体制的影响越强。地区差异主要由近代企业发展的特点所决定。作为商品生产的场所，企业发展不仅需要不断扩张的市场需求和良好的经贸环境，也需要以货币财富和资本积累为支撑。与中西部相比，当时东部地区无论在地理、人力和物资资源、市场环境等方面都具有优势。也正因如此，大量的民办企业尤其是以面粉、棉纺、火柴等为代表的民办企业首先会选择在东部设厂，而非中西部。相应的，它们对产权保护和捐官的需求也更为强烈。

表3 地区差异的影响

地区划分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捐纳比例 (%)	捐纳人数 (log)	捐纳比例 (%)	捐纳人数 (log)
	(1)	(2)	(3)	(4)
民办企业数量 (log)	19.369** (8.104)	0.210** (0.097)	10.967 (12.517)	0.035 (0.090)
官办企业数量 (log)	4.946 (14.258)	-0.020 (0.170)	-17.797 (19.054)	-0.025 (0.137)
外资企业数量 (log)	1.193 (11.331)	-0.050 (1.135)	-27.592 (24.448)	0.062 (0.176)
自然、地理因素等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80	180	360	360
R-squared	0.391	0.471	0.265	0.478

注：自然、地理因素等包括战争次数、自然灾害程度、距北京的距离，所有回归都控制了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sup>\*\*\*</sup>  $p < 0.01$ , <sup>\*\*</sup>  $p < 0.05$ , <sup>\*</sup>  $p < 0.1$ 。

### 2. 捐纳类型差异的影响

为了验证新式企业对捐官的影响，我们将样本划分为捐纳身份和捐纳实职分别进行估计，具体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第(1)、(2)列是以捐纳身份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民办企业的发展促进了捐纳身份程度的提

升，但官办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第（3）、（4）列是以捐纳实职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哪一种性质的企业都不会影响捐纳实职的比例。这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对实职官员的任命有着比较严格的控制；另一方面也说明民办企业捐纳的动机主要是对自身企业产权的保护，而非实职官位的获取与晋升。

表 4 捐纳类型差异的影响

	捐纳身份		捐纳实职	
	身份比例 (%)	身份人数 (log)	实职比例 (%)	实职人数 (log)
			(1)	(2)
民办企业数量 (log)	10.714** (4.687)	0.154*** (0.045)	3.876 (5.253)	0.058 (0.051)
官办企业数量 (log)	-0.379 (7.755)	-0.058 (0.074)	-1.265 (8.692)	-0.045 (0.085)
外资企业数量 (log)	-8.708 (7.207)	-0.103 (0.069)	9.787 (8.079)	0.105 (0.079)
战争次数	-4.315 (3.049)	-0.038 (0.029)	-0.190 (3.418)	0.005 (0.033)
自然灾荒	2.430** (1.198)	0.027** (0.011)	0.404 (1.343)	0.005 (0.013)
到北京的距离 (log)	-1.936 (1.641)	-0.054*** (0.016)	2.759 (1.840)	0.009 (0.018)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540	540	540	540
R-squared	0.142	0.334	0.227	0.416

注：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p < 0.01$ , \*\*  $p < 0.05$ , \*  $p < 0.1$ 。

### 3. 行业差异的影响

晚清的工业化转型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共同推进的结果，与重工业相比，虽然轻工业的发展规模和投资金额较低，但是企业数量、发展速度、设立地区更加广泛，与人民日常生活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为了检验不同行业对买官偏好和动机的影响差异，表 5 分别按照重工业企业、轻工业企业的划分来估计行业性质与捐纳程度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发现，轻工业对捐纳身份的比

例和人数都具有促进作用，重工业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是因为受制于资金与资源的限制，民办企业更多地只能参与轻工行业。进一步对捐纳实职的情况进行估计，结果发现轻工业并不会促进捐纳实职比例的提升，但是重工业的发展对捐纳实职的人数会有提升作用，表明当时重工业主要由政府直接创办和管理，其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府官僚队伍中捐官人员的增加，但其捐纳行为并非寻求企业发展的产权保护。

表5 行业差异的影响

	捐纳身份		捐纳实职	
	身份比例 (%)	身份人数 (log)	实职比例 (%)	实职人数 (log)
			(1)	(2)
轻工业企业数量 (log)	7.938 *	0.084 **	1.007	-0.002
	(4.324)	(0.041)	(4.846)	(0.047)
重工业企业数量 (log)	-5.603	0.059	4.313	0.172 *
	(9.214)	(0.088)	(10.325)	(0.101)
战争次数	-3.888	-0.031	-0.448	0.004
	(3.045)	(0.029)	(3.412)	(0.033)
自然灾荒	2.320 *	0.026 **	0.424	0.005
	(1.197)	(0.011)	(1.341)	(0.013)
到北京的距离 (log)	-1.091	-0.043 ***	2.191	0.003
	(1.602)	(0.015)	(1.795)	(0.017)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540	540	540	540
R-squared	0.137	0.323	0.224	0.415

注：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p < 0.01$ , \*\*  $p < 0.05$ , \*  $p < 0.1$ 。

#### 4.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出于产权保护的动机，民办企业发展对捐纳具有促进作用，但是这一结果可能存在因缺失变量、度量误差和互为因果关系所引起的内生性估计偏差问题。特别是人们捐纳获取官职后，可能会通过向企业经营者提供直接保护，或者改变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来反过来促进企业的发展。我们通过带有工具变量的两阶段回归来消除这一效应。

按照前述式(3)第一阶段回归的估计结果，口岸开放的时间越长，民办企业、官办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设立数量越多。表6为2SLS第二阶段的回归结

果, 通过使用工具变量对内生性进行处理后,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方面的结论: 第一, 就民办企业对捐官的促进作用, 不论是获职官员中的捐纳程度, 还是获职官员中购买身份的人数和比例, 新式民办企业对其影响的系数都显著为正, 并且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其系数有所增加, 说明基准估计确实可能受到了内生性或度量误差造成的估计偏差, 使回归系数有所低估。同时, 与表 4 中的估计结果不同的是, 民办企业的发展对于捐纳实职的人数也具有了正向影响。第二, 不同于基准回归结果, 利用工具变量分别对官办企业和外资企业进行估计, 回归结果显示这两类企业对于总的捐纳程度、购买身份和购买实职人数也都具有了正向的促进作用。这进一步表明基准回归方程中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和度量误差等问题, 官办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人们的捐官, 同时也与表 5 中关于重工业和表 7 中关于外资企业对捐纳实职人数的促进作用是一致的。因此,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一方面进一步确认了新式民办企业出于产权保护的动机, 对捐官具有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 官办和外资企业的经营者为追求社会地位的提升、享受政治特权, 或者官僚体制内部的晋升, 也具有较为强烈的捐官纳衔的需求。近代工业化和新式企业基于不同的动机和机制推动了晚清捐官的发展。

表 6 工具变量 2SLS 估计结果

	总比例 (%) (1)	总人数 (log) (2)	身份比例 (%) (3)	身份人数 (log) (4)	实职比例 (%) (5)	实职人数 (log) (6)
民办企业数量 (log)	59.647** (29.119)	0.676*** (0.228)	46.515** (21.995)	0.573*** (0.173)	18.181 (19.791)	0.452 ** (0.195)
官办企业数量 (log)	188.244 * (101.857)	2.132** (0.891)	146.798 * (77.390)	1.807** (0.715)	57.379 (63.675)	1.425** (0.696)
外资企业数量 (log)	168.747 * (92.301)	1.911** (0.815)	131.593 * (70.689)	1.620** (0.661)	51.436 (57.171)	1.277** (0.627)
自然、地理因素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540	540	540	540	540	540

注: 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sup>\*\*\*</sup>  $p < 0.01$ , <sup>\*\*</sup>  $p < 0.05$ , <sup>\*</sup>  $p < 0.1$ 。

总之, 尽管官办企业和重工业是近代工业化的起点, 并在创办之初就吸收了大量捐纳官员、候补官员参与经营管理, 但是, 不同于官办企业经营者提升社会地位和官职晋升的捐纳动机, 在缺乏正式法律地位和特许权保护的背景下, 民办企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促使人们为寻求产权保护而进行捐官。其

机制主要是通过捐纳“考试等级”、虚衔（身份）而非实职来推动的。<sup>6</sup>由于民办企业和轻工业更好地代表了近代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正是新的经济因素激励了人们提升社会地位，并对新式经济提供保护的政治需求。也正是经济发展从根本上推动了晚清时期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变革。

## 五、捐官行为与动机

### （一）捐纳对不同品阶官职的影响

清朝官僚体系从上到下分至“九品十八阶”，等级制度十分严格。不同品阶的官员在待遇和行政权力方面具有很大差别。通过对捐纳不同品级官员的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国家行政、经济、法律的实施和管理。由于吏部通过月选铨选任命的官员为四品及以下官职，因此我们对四品至七品官员分品级进行考察。表7的回归结果显示，民办企业主要促进了六品、七品官阶的捐纳身份的比例，六品、七品官员主要为直接掌管地方经济、文化、政治大权的基层重要官员，说明拥有六、七品职衔和身份已经可以较好地与地方政府沟通和交涉，可以对企业的的发展起到较好的保障作用。外资企业也对四品和五品的捐纳实职人数具有促进作用，这可能恰好反映了外资企业的发展对筹办地方洋务事业的推动，使得熟悉并热衷洋务，并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官员通过捐纳进入官僚等级的更高阶层。

表7 新式企业对捐纳不同等级官缺的影响

	四品、五品		六品、七品	
	捐身份人数(log)	捐实职人数(log)	捐身份人数(log)	捐实职人数(log)
	(1)	(2)	(3)	(4)
民办企业数量 (log)	-0.004 (0.017)	0.031 (0.026)	0.132*** (0.041)	0.029 (0.047)
官办企业数量 (log)	0.019 (0.028)	-0.032 (0.043)	-0.045 (0.068)	-0.101 (0.078)
外资企业数量 (log)	0.016 (0.026)	0.084** (0.040)	-0.146 (0.063)	0.102 (0.072)

<sup>6</sup> 由于大批进入近代新式企业的经营者或管理者大多是捐纳虚衔、身份而非实职来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并寻求产权保障，而上述数据中并没有包括大量捐纳虚衔的情况，因此新式企业发展对于人们为寻求产权保护而进行捐纳的促进作用，仍然可能存在很大程度的低估。

(续表)

	四品、五品		六品、七品	
	捐身份人数(log)	捐实职人数(log)	捐身份人数(log)	捐实职人数(log)
	(1)	(2)	(3)	(4)
自然、地理因素等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540	540	540	540
R-squared	0.128	0.142	0.308	0.403

注：自然、地理因素等包括战争次数、自然灾害程度、距北京的距离，所有回归都控制了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sup>\*\*\*</sup>  $p < 0.01$ , <sup>\*\*</sup>  $p < 0.05$ , <sup>\*</sup>  $p < 0.1$ 。

## (二) 对科举、荫举入仕的影响

由于参与铨选的官员入仕途径并不一致，为了更全面地分析新式企业对不同途径的官员入仕做官的影响，我们对捐官入仕、科举入仕和通过父辈荫赐入仕的官员分别进行估计，结果见表 8。其中，第(1)、(2)列为不同类别的企业对捐官获职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民办企业仍然是促进人们捐献的重要因素。第(3)、(4)列选择进士作为科举入仕官员的代理变量，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官办企业、民办企业，还是外资企业，企业的增加都不会影响进士补缺官职的比例，相反，民办企业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获职官员中的进士人数。第(5)、(6)列为父辈荫赐官员入仕的情况，回归发现新式企业对荫举官员的获职并没有影响。晚清时期，由于科举入仕的难度越来越高，父辈荫赐又有着明显的身份限制，而新式企业的发展则为具有才能和高智商者提供了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新途径。他们可以通过选择企业经营和捐官而非单纯的科举考试来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因此，随着整个官僚队伍的增加，工业化的推进和新式企业的发展对科举入仕做官具有一定的削弱作用。

表 8 新式企业对科举、荫举入仕的影响

	捐官获职		科举获职		父辈荫赐获职	
	人数 (log)	捐官占比 (%)	人数 (log)	进士占比 (%)	人数 (log)	荫举占比 (%)
	(1)	(2)	(3)	(4)	(5)	(6)
民办企业数量 (log)	0.138** (0.057)	14.262** (6.829)	-0.088 * (0.051)	-7.094 (6.138)	0.011 (0.030)	-0.726 (2.647)
官办企业数量 (log)	-0.040 (0.094)	-3.324 (11.300)	0.031 (0.084)	-7.562 (10.156)	-0.047 (0.050)	-4.572 (4.380)

(续表)

	捐官获职		科举获职		父辈荫赐获职	
	人数 (log)	捐官占比 (%)	人数 (log)	进士占比 (%)	人数 (log)	荫举占比 (%)
	(1)	(2)	(3)	(4)	(5)	(6)
外资企业数量 (log)	-0.002 (0.088)	1.875 (10.504)	-0.075 (0.078)	-6.401 (9.440)	-0.032 (0.046)	0.356 (4.071)
自然、地理因素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540	540	540	540	540	540
R-squared	0.478	0.262	0.296	0.267	0.226	0.194

注：自然、地理因素等包括战争次数、自然灾害程度、距北京的距离，所有回归都控制了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sup>\*\*\*</sup>  $p < 0.01$ , <sup>\*\*</sup>  $p < 0.05$ , <sup>\*</sup>  $p < 0.1$ 。

## 六、结 论

清代是传统社会捐官制度发展最为完善和成熟的一个历史时期，其捐纳种类分为捐“考试等级”（身份）、捐虚衔、捐实职、“捐升”等不同类别。与科举相比，捐纳给渴望入仕的庶民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机会，成为提升社会地位和社会阶层流动的有利工具。关于捐纳制度的探讨，以往研究大多是从政府财政压力角度，探讨捐纳制度的演变，并进一步指出政府出售官职的行为会导致吏治腐败。本文对现有假说进行回应，并提出影响捐官制度发展的新机制，即新式企业发展对捐官行为的影响。

研究表明，基于产权保护的动机，相对于官办企业和外资企业而言，代表近代新式经济的民办企业促进了人们捐纳职衔。从地域上来看，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对产权保护和捐官的需求越强烈；从捐纳类别来看，民办企业的捐纳动机主要是通过身份提升来对自身企业产权进行保护，而非实职官位的获取与晋升；从行业来看，因民办企业多属于轻工业领域，因此轻工业对捐纳身份的比例和人数都具有促进作用。此外，从捐纳职衔等级来看，民办企业更倾向于激励人们捐纳能够对企业发展起到保障作用的六品、七品职衔。

总之，晚清时期政府出卖官职源于自身的财政压力和资金需求，而人们捐官的偏好则受到两类不同的动机和机制所激励。由于官办或者官督商办企业本身就附属于政府体制，而外资企业享有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其经营

者捐官的动机主要是官僚体制内部的晋升或享受政治特权；而在缺乏明晰的产权保护和公平竞争的社会保障条件下，新式民办企业则是通过捐官纳贿来寻求企业发展的产权保障。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经济发展和官僚体制的关系，特别是关于晚清捐官机制和官商关系问题的研究，改变了以往单纯地区化、事例性或限于特定人物的定性考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制度、产权与工业化关系的研究，为理解近代经济发展、产权保护机制与官僚体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微观视角。同时也为当前企业发展、产权保护和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历史镜鉴。

## 参 考 文 献

- [1] Acemoglu, D. , S. Johnson, and J. A. Robinson,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 1369-1401.
- [2] Acemoglu, D. , and S. Johnson, “Unbundling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5, 113, 949-995.
- [3] Acemoglu, D. , S. Johnson, and J. Robinson,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 95, 546-579.
- [4] Bai, Y. , “Farewell to Confucianism: The Modernizing Effect of Dismantling China’s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Diss. PhD thesis, 2014.
- [5] Bai, Y. , and R. Jia, “Elite Recruitment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The Impact of the Abolition of China’s Civil Service Exam”, *Econometrica*, 2016, 84 (2), 677-733.
- [6] 陈锋，《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年。
- [7] 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
- [8] 代谦、别朝霞，“土地改革、阶层流动性与官僚制度转型：来自唐代中国的证据”，《经济学》（季刊），2015 年第 15 卷第 1 期，第 53—84 页。
- [9] 杜恂城，《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
- [10] 杜兴强、曾泉、吴洁雯，“官员历练，经济增长与政治擢升——基于 1978—2008 年中国省级官员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2012 年第 2 期，第 30—47 页。
- [11] 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
- [12] Jha, S. , “Financial Asset Holdings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Evidence from Revolutionary England”,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5, 130 (3), 1485-1545.
- [13] Landry, P. F. , “The Political Management of Mayors in Post-Deng China”, *The Copenhage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2005, 17, 31-58.
- [14] Li, H. , and Li-An Zhou,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 89, 1743-1762.
- [15] Maskin, E. , Y. Qian, and C. Xu, “Incentives, 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Form”,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 2000, 67, 359-378.
- [16] North, D. C. , and B. R.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

- tional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89, 49 (4), 803-832.
- [17] Opper, S., and S. Brehm, “Networks versus Performance: Political Leadership Promotion in China”,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Lun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2007.
- [18] 秦国经等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共30册)。武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1997年。
- [19] 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 [20] 姚洋、张牧扬,“官员绩效与晋升锦标赛——来自城市数据的证据”,《经济研究》,2013年第1期,第137—150页。
- [21]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
- [22] 伍跃,《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
- [23] 王贤彬、张莉、徐现祥,“辖区经济增长绩效与省长省委书记晋升”,《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1期,第110—122页。
- [24] 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新史学》(中国台北),1999年第10卷第3期,第55—110页。
- [25] 谢俊美,“晚清卖官鬻爵新探——兼论捐纳制度与清朝灭亡”,《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第50—61页。
- [26]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第36—50页。
- [27] 张玉法,“清末民初的外资工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
- [28] 张玉法,“清末民初的官办工业”,《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
- [29] 张玉法,“清末民初的官督商办工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
- [30] 张玉法,“清末民初的民营工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
- [31]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
- [32]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战争年表》。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
- [33] 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1年。

#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ization on the Official Don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entered on the Mechanism of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nterprises

HONGZHONG YA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N WEI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Zhongtai Securities)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cords of officials in Qing Dynasty, we study the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of modern industrialization on the behavior of the donator in late q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perty right protec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due to the lack of formal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guarantee of concession right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new-style enterprises represented by private-owned enterprises urges people to enhance their social status and seek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by donating their titles.

**Key Words** modern enterprises, donation system, property protection

**JEL Classification** N45, O17, P48

---

\* Corresponding Author: Hongzhong Yan, Rm310,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SFFE), 777 Guoding Road, Yangpu District, Shanghai, 200433, China; Tel: 86-21-65902210; E-mail: hzhyansx@163.com.